

doi:10.3969/j.issn.1672-0598.2025.03.013

空间生产与社区营造:民国时期乡村建设 北碚模式及其当代意义^{*}

林顺利,赵紫璠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

摘要:如何实现空间生产与社区营造,促使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化进行转型,是乡村振兴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以民国时期北碚的乡村建设运动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北碚乡村建设中空间生产的过程与历史经验,借以发掘乡村建设进程中社区营造的基本逻辑。研究发现,乡村既有的产物是空间生产的客观基础,基于乡村特色的优化改造则是社区营造的重要手段。这对我国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空间生产;社区营造;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北碚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5)03-0159-11

一、问题提出:“乡村振兴”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

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明确指出,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着力推进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农村社会整体进步、农民素质能力全方位提升,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从空间角度来看,对于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和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来说,“乡村振兴”意味着一种全面指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空间生产”,是对传统乡村的一种“社区营造”。作为擅长社区增能的理念和技术的一门专业和职业,抑或是一类技术人才,社会工作在推动乡村基层社区营造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也从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对社会工作提出了战略要求。其实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就曾经兴起过以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为目标的“乡村建设运动”。当时正值晚清以降,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自然灾害与战争频发,造成当时中国的小农经济濒临崩溃,乡村呈现衰败景象。国内社会精英意识到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开始着力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出现了如晏阳初的定县模式、梁漱溟的邹平模式、陶行知的晓庄师范模式、黄炎培引领的职业教育模式以及卢作孚的北碚模式等

^{*} 收稿日期:2024-09-1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2JZD026)“中国社会工作通史研究”

作者简介:林顺利(1978—),男,河北保定人;博士,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赵紫璠(2000—),女,山东济南人;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工作历史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林顺利,赵紫璠.空间生产与社区营造: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北碚模式及其当代意义[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3):159-169.

经典案例。其中,卢作孚的“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的乡村建设实验持续时间最长,取得成就最大,保存记录也最为完整^{[1]27}。现在来看,与其他模式相比,卢作孚的北碚乡村建设模式更为注重整体的社会生态系统改善,带有以社区营造来推动地方社会空间生产的特征,可以为我国乡村振兴中的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参考。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旨在遵循发展规律,构建乡村内“人”“地”“业”耦合格局,推进乡村协调与可持续发展^[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政策体系,促进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3]。长期以来,农村社区建设聚焦于物理空间,而农村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未能得到同等重视,这不仅导致农村社区建设的活力不足,还缺乏激发活力的内在动力^[4]。在此背景下,以社区营造来推动地方社会空间生产,不仅能够激活社区活力,还能够帮助社区实现“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5]161},助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

有鉴于此,本文对卢作孚的“北碚模式”进行历史回顾和梳理,试图探究如下问题:在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乡村建设如何进行空间生产?乡村建设的物质空间营造、社会空间营造与精神空间营造如何展开?乡村如何实现社区营造?这对我国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有何启示?

二、理论溯源:空间生产与社区营造

19世纪末,社会空间的概念被引入。简单来说,社会空间不再仅仅被看作“下为地,上有屋顶,四周有墙围绕”等物理实体^[6],而是被赋予了政治的或社会的意涵^[7]。到了20世纪中叶,社会科学界开始经历所谓的“空间转向”^[8]。这一转向的最大成就,就是重新定义了空间,从而重新塑造了地理学的知识体系和人类通过空间建构展现的生活实践^[9]。在众多关于空间的社会学阐释中,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并阐述了展示空间生产过程的“三元空间辩证法”^[10]。三元空间包括: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性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representational spaces),可以大致对应为物质空间、(狭义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这三种主要的空间形式^[11]。空间实践指的是空间的感知层面,是一种外部的、客观的且可被感知的物质空间,它既是空间生产的过程,也是其结果^{[12]130}。空间的表象是指对空间的构思,它是一种引导实践的概念化空间。表征性空间则指的是空间在生活中的层面,是通过空间使用者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12]131}。空间生产理论是一种用来理解空间、时间和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框架,其主要关注的是空间的生产过程,即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是如何被创造和再创造的^[13]。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口流动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给传统社区带来了冲击,大多已无法形成传统的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亲密共同体。1915年加尔平(C. T. Galpin)在《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解剖》中延伸了“农村社区”的概念;同年,美国社会学家F. 法林顿(Farrington)将发展的理念带入社区,率先提出“社区发展”的概念。与此同时,“社区”实践同步发展。日本的社区营造理念源于欧美,主要受彼得·克洛普特金(Peter Kropotkin)提倡的“地方公社”实践和美国的简·亚当斯(Jane Addams)领导的“睦邻社区运动”的深刻影响^[14]。从实务层面看,“社区营造”这一概念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民间的社区改造运动,它提出的原始目的是让居民生活得更为舒适和美好^[15]。从理论层面看,东京大学西村幸夫教授对2000年以前日本的社区营造运动进行了一种理想化诠释,佐藤滋则对2000年之后日本的社区营造运动

进行了一种新的内涵界定。1996年,东南大学张燕教授最早引进并介绍了“社区营造”这一概念,细致介绍了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的乡村改造与保护运动,重申了“经济追求和文化维护同样重要”的社区营造理念^[16]。1997年,聂兰生也关注了社区营造对于未来社区构建的具体价值^[17]。在这一概念被引入后,我国学者基于其原有内涵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造。一是强调在“社区营造”中政府引导规划、多方主体参与的模式;二是强调以社区新人培养为核心的“三自”建设目标;三是吴晓林和谢伊云提出了“社区营造就是创制社会”的命题^[18]⁶⁴。总体来看,农村社区营造是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寻求的一种自我驱动发展模式^[19],通过建立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社区营造模式,将“人、文、地、产、景”五类资源的挖掘、保护、利用、整合作为核心,提升乡村的多元价值,进而帮助农村社区实现“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5]¹⁶¹。

社区营造的核心要素与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盛、环境宜居、文化繁荣、治理高效、经济富足”的总体目标具有内在耦合性。具体而言,“产”聚焦于生产要素,“产业兴盛”指通过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乡村旅游、培育新型服务业等举措,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地”与自然资源相对应,“景”则与景观美学相关联,而“环境宜居”强调构建适宜居住的乡村生态,以此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文”涵盖文化资源,“文化繁荣”侧重于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满足村民的精神追求与道德素质的提升;“人”作为关键资源,“经济富足”目标在于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居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社区营造的最终愿景是赋能社区,使之达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状态^[5]¹⁶⁹。“治理高效”的主要目标则是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和机制,实现乡村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20]。可见,社区营造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耦合性,可以作为推动农村现代化的一种微观维度的实践策略。

此外,社区不仅是实体存在的物理空间,也是承载着社会交往的社会空间,更是社会关系汇聚与社会结构形塑的产物。空间生产是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生产与营造,乡村社区营造则是一种整体性乡村改造,社区营造的本质则是一种朝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空间生产。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空间生产就是乡村基于原有的乡土社会特征,在建设的过程中摒弃“糟粕”,结合现代化要素进行创造性构造,推陈出新,使其能够进行现代化意义上的生产与构造,实现乡村社会的空间生产,即整体性社区营造,从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空间”是实现社区营造的最基本要素,实现社区营造的基础在于“空间”在时间转换下不断生产与构造的过程。在物质空间营造过程中,空间生产基于乡村既有产物进行社区营造;在社会空间营造过程中,空间生产通过权力关系网络的实践而实现社区营造;在精神空间营造过程中,空间生产通过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交往以及时代背景的转换不断进行社区营造。换言之,通过空间实践的物质空间营造、空间的表象的社会空间营造与表征性空间的精神空间营造,不仅能够实现现代化与乡土社会的双向连接,还能够重塑乡村意义,使其在现代化背景下实现社区整体性营造。

三、空间实践:北碚乡村建设的物质空间营造

空间实践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能感知和使用的物质性空间或自然空间。这个意义上的空间,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与自然打交道的物质生产实践的空间化重述^[21]。哈维(David Harvey)从城市空间布局与城市化的视角出发,探究了当代社会空间创造的过程及其重要性,指出空间创造与社会生产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两个紧密相连的方面,构建新型社会形态的同时,也要求重塑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空间”^[22]。“空间”是与一定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体现为“社会”的一种具体实践与再生产,是实践空间的生产与发展^[23]。物质空间的构建是空间实践的关键方式,它为社区营造提供了基础与必要

条件。因此,以物质空间为基础的空间实践能够实现社区营造良好的基础。本文以此为线索回溯卢作孚所开展的“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发掘和梳理这一模式中“社区营造”性质的空间生产实践。

(一) 交通与乡村城市化:物质空间的系统性营造

社区空间具有多维属性,空间实践具有多重诉求。北碚乡村建设坚持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从社区生态系统方面实现物质空间的营造。生态系统理论将系统划分为微观、中观及宏观三个层次,这些层次依据其影响范围界定,相互关联,持续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流互动,共同对系统内的个体产生深远影响^[24]。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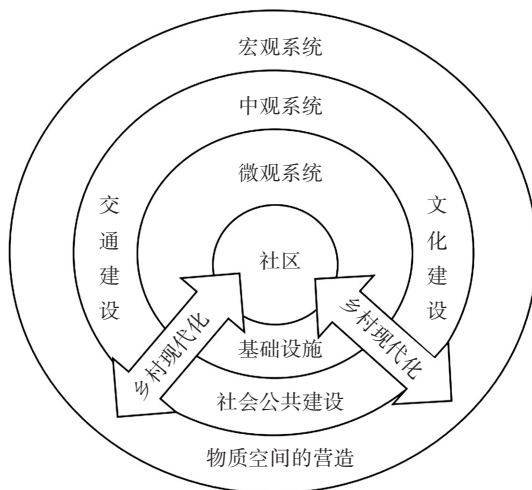


图1 北碚乡村建设营造的生态系统分析框架

北碚注重交通建设,其领导者卢作孚认为“交通建设是去除一切障碍的基础”^{[25]389}。基于此,卢作孚在开展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时,将交通建设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与此同时,其领导者卢作孚认识到,乡村现代化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产物^[26]。因此,卢作孚在开展乡村建设时“以嘉陵江三峡为范围,以巴县的北碚为中心”^{[25]267}，“由于此范围比较集中,从而较容易在周围扩大起影响”^{[25]279}，“通过这样以小带大的程序在北碚做试验,供其他乡村甚至于整个国家作参考,从而能够帮助到各方面的建设”^{[25]278}。其主要工作思路是以北碚为中心,通过北碚的现代化建设带动整个峡区的现代化建设。卢作孚认为,乡村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建设,而是“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文化建设和社会公共建设从而实现现代化”^{[25]279}。因此,卢作孚在开办工厂的同时,还积极创办地方医院、公共运动场、动物园、博物馆,以及创建学校,从而通过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物质空间的营造。

(二) 公共服务:物质空间的公共性营造

从空间意义上看,社区是一定的地域空间内的群体集合物^[27]。社区空间具有公共性,同时社区公共空间反过来可以实现社区公共性的再生产。在此意义上,社区公共空间能为社区公共性的再造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28]23}。为了促进物质空间公共性的构建,北碚乡村建设致力于推动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1928年,《嘉陵江报》的创办确保了峡区建设信息的及时传播。为了改善峡区的基础设施,在北碚兴建一所地方医院。同时,公共体育场的建立旨在提升峡区民众的健康状况,而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成立则进一步丰富了学术与文化资源。中国西部科学院也成为四川省第一个专注于科学研究的机构。为帮助峡区解决燃料问题,建立理化研究所。为帮助峡区解决一切自然开发问题,建立生物研究所。为解决当前社会急需的粮食问题和木材问题,建立农林研究所。此外,图书馆、植物

园、动物园及博物馆等机构的设立,为峡区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另一方面,卢作孚在公共服务领域采取了多项举措,涵盖了多个方面。一是维护社会秩序。其一,卢作孚采取“化匪为民”等策略,主持清剿匪患工作。其二,组建义勇队和警察队,定时巡查街道,以维护治安。二是改善生态环境。卢作孚亲率队伍打扫街道等,并动员民众积极参与其中。通过一系列策略,北碚从“地势险恶,交通闭塞,盗匪横行,经济极其落后,仅有两条狭窄主街和几条巷道,房屋低矮凌乱,人烟稀少的小乡场”^[29]转变为“安居乐业的福地”^{[30]248},并且“成为后来的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31],实现了物质空间的公共性营造。

社区具有空间性的特征,社区营造具有众多范畴。北碚的空间实践以乡村原有的物质空间为基础,通过空间性这一社区特性的塑造,探索北碚物质空间营造的内在逻辑,从而形成北碚空间实践的理念,为北碚乡村实现社区营造奠定良好基础。

四、空间的表象:北碚乡村建设的社会空间营造

空间的表象指的是被概念化的社会空间,即通过话语性和概念性的知识建构、生产和规划出来的空间。与物理空间不同的是,这种类型的空间强调的是空间之上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等的再生产^[32]。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社会空间的生产就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33]。社会空间营造是空间的表象的主要表现,是实现社区营造的必要因素。社区营造是一种具有极强在地性差异的社区实践活动^[34],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对实践的深入研究梳理乡村社区营造的逻辑。

(一) 系统设计:社会空间的整体性营造思路

社会空间具有复杂性,其存在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性基础作为保障。因此,社会空间的营造也需要从整体性出发,从而使人们在此基础上有目的地开展活动。在此意义上,北碚乡村建设以经济为主导,从文化、人民与地位等方面进行整体性营造,从而实现社区营造。空间是由物理性空间和社会性空间共同构成的一种二元空间,其领导者卢作孚认为,“我们凡做一桩事情,从开头到终了,事前都应当计划得很清楚,如像会计处有会计处的计划,总公司有总公司的计划,全公司有全公司的计划,同时,个人也有个人的计划”^{[25]333}。因此,其领导者卢作孚提出,“始则造起一个理想,是要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25]267},“供中华民国里小至于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的参考”^{[25]278}。基于此,卢作孚从经济、文化、人民与地位方面拟作了如下设计,从而实现“社会空间的整体性营造”^{[25]282}。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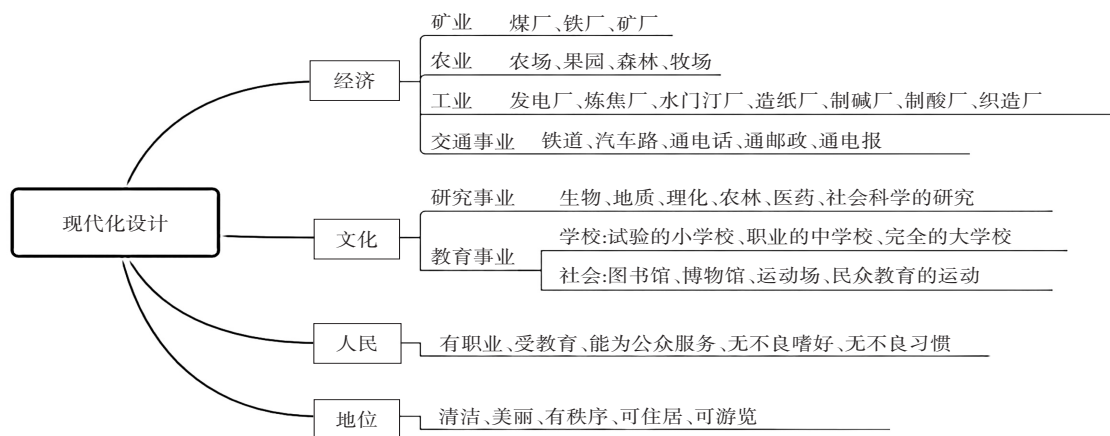


图2 北碚模式的社会空间营造的现代化设计

(二) 地方经济与集体生活:社会空间的整体性营造举措

1. 地方经济

利益是人类行为的起点,没有足够的共同利益,即使居住空间再集中,也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35]。共同的物质活动和共同的物质交往决定了人们共同的社会空间,北碚乡村建设从开展金融服务、开展经济事业、挖掘地方特色资源三方面发展共同利益,通过“共同利益”的创建与营造,促使人们形成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实现社会空间的营造。

第一,以工业振兴经济。卢作孚提出“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这三方面的建设诚当并重,但更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当集中一切力量于经济建设”^{[25]451}。对于为什么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卢作孚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解答,首先是“任何建设都应该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其次,“需要增进人民的富力”;最后,“应保证国家的最大多数人必须参加经济活动”。^{[25]452}基于此,卢作孚开展了多项经济事业,如建立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铁公司、洪济造冰厂、嘉陵煤球厂等。其中,“北川民业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为北碚的各个工厂和矿山提供了充足的能源供应,使其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重要燃料基地,盈利的天府煤矿也对北碚的乡村建设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1949年这22年中,北碚拥有原煤、棉纺、化工、医药、印刷、建材、电力、玻陶、食品、畜产品、五金工具等10多个工业门类,拥有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现代化采煤和棉纺织联合企业。由于工业经济的发展,北碚从一个“一曲清溪绕几家”的小乡场,迅速建成一座10万人口逐渐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具有现代风貌的中等城市^{[36]47}。

第二,卢作孚非常关注农村的金融服务。他认为,缺乏资金是制约农村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他创立了北碚农村银行和北碚民众消费合作社,旨在“调节农村金融,支持农民生活”,以协助农民借贷和促进各种合作活动。此外,在剿匪的第一年,卢作孚就着手试验兵工织布项目,“买机头数架,令常队、练队士兵练习织布”,并设立工艺部加以管理,后来四川第一家机器织布工厂恰由此发端。^[37]“如果有匪来了,我们拿起枪背起弹就是兵。把匪打了,放下枪就是良好的百姓,并且工业办好后,不仅人人有红息分,队兵的家属还可以搬到这里来住家,帮我们做些事”^{[38]125}。

第三,卢作孚积极挖掘并开发当地的特色资源。如,卢作孚在被任命为峡防局长后,亲自起草了第一篇公告《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在其中从风景、古迹、产物和交通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温塘峡边一座破败古庙的独特价值和开发潜力。“学生可到此旅行,病人可到此调摄,文学家可到此涵养性灵,美术家可到此即景写生,园艺家可到此讲求林圃,实业家可到此经营工厂,生物学者可到此采集标本,地质学者可到此考察岩石,硕士宿儒可到此勒石题名,军政绅商都市生活之余可到此消除烦虑……”^{[25]50}

2. 集体生活

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社会秩序的维持离不开参与者共有的记忆基础。社区则是那些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个体进行社会互动的区域性共同体^{[28]44}。北碚乡村建设从倡导集体生活入手,通过塑造新的记忆,形塑新的社会认同,从而实现社会空间的社会性营造。卢作孚认为,“中国社会前进的最大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下所产生的‘两重集团生活’,即家庭生活以及由其所扩展的亲戚关系、朋友关系以及邻里关系。这种双重集团生活造成了社会的松散,国民的松散以及农民的松散”^{[25]255}。因此,卢作孚提出了“现代集团生活”概念用来指称借鉴西方,使个人不再过分依赖亲戚、朋友和邻里关系,而是更多依靠社会和国家的生产和生活模式^{[1]28}。他认为:“目前,我们要想中国有办法,我们一方面要打破原来的集团生活的依赖关系(即个人对家庭的依赖关系),创造新集团生活的依赖关系(即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关系);打破原来不合理的比赛标准,悬起新集团的比赛标准。这样就可以创造

伟大的社会动力,以推动社会的发展。”^{[25]302}

为此,他在北碚采取了三种举措:第一,以北碚峡防局作为群体生活的典范。自1927年起,北碚峡防局成立义勇队、手枪队和警察队,招募一些中学程度的年轻人进行培训。并推动他们参与各种集体行动,展开各种社区服务。如,“有警察的任务,有民众教育的任务,有帮助地方建设的任务”^{[25]268}。第二,举办集体活动,吸引民众参与。如,“有职业介绍所、书报阅览室;在各茶社酒店有各种通俗图书、照片和新闻简报,有新知识广播;有民众娱乐场,娱乐事项有川剧、电影、新剧、跳舞、幻灯、唱歌等;有公共运动场,使青年都参加运动”^{[25]268}。“于节假日之际,开放在建及已竣工的铁路设施、工厂厂房,连同博物馆、科研单位、教育机构及行政机关,邀请邻近乡村的居民前来实地探访体验”^{[25]268}。第三,“通过《嘉陵江报》《北碚月刊》等报刊宣传集体生活理念,引导民众参与各种集体活动”^{[1]28}。为了转变乡村居民的思想观念,卢作孚倡导北碚地区的工厂、教育机构、行政机构及博物馆等场所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本地乡民的参观,引发了一定的轰动效应。据《嘉陵江报》报道,峡防民众俱乐部为民众举办了幻灯放映活动,活动中,卢作孚亲自为观众阐释了幻灯所展示的内容。他的讲解有“不少传神处,故很能引人入胜”,使市民们“洗耳静听”,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30]147}。

五、表征性空间:北碚乡村建设的文化营造

表征性空间,指的是被感知的、被想象的、被表现的精神空间,是空间的使用者和居民的空间体验和想象^[32]。表征性空间是在地人群直接经历的空间,进行日常意义和地方知识的生产和占用^{[39]34}。精神空间的营造作为表征性空间的核心展现,是实现社区营造的必要因素。在北碚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文化营造成为精神空间构建的关键突破口。通过创办民众学校、推广普及教育提升居民知识水平。同时,对文化教育的重视,能够使北碚乡村社会形成独特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观念。因此,北碚乡村建设通过兴办学校教育、发展社会教育这一重要途径,从而实现精神空间的营造。

首先,积极兴办学校教育。卢作孚认为:“教育是乡村中最重要的建设事业。因为一切事业都需要人去建设,人是需要教育培[育]成的,所以努力建设事业的第一步是应努力教育事业。”^{[25]75}基于此,北碚乡村建设积极创办学校教育。对于学龄儿童,提出“普及小学教育”“扩充中等以上的教育”“以训练儿童之行为为主”“以实验及观察的教学方法为主”^{[25]39-40}等理念。此外,还资助并设立众多学校,如南开中学,北碚第一所高级小学、实用小学和兼善中学等。对于社会民众,学校教育涵盖十余所夜校,如建立职业学校、工人学校和船夫学校等。“教育是用以培养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的,科学研究是用以克服经济建设所遭遇的困难的。”^{[25]451}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在北碚工作和生活而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学部委员)的科学家就有60余人^{[36]49}。就一个社会而言,当它在经历转型进而变革时,总会带有过去的印记,空间生产与社区营造则成为过去与现代的一个桥梁,连接着传统与创新的两端。通过对原有乡土社会的深度挖掘与精心规划,空间生产不仅保留了那些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文化价值的乡土产物,使它们在现代社会的脉络中得以延续与重生,更在这一过程中融入了现代的设计理念与发展理念。这种融合,既是对乡土文化的一种尊重与传承,也是对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积极响应与适应。在这样的空间里,过去与现在相互交织,展现了社会转型与变革中既不失根基又勇于创新的生动实践。

其次,努力发展社会教育。卢作孚认为,乡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乡村现代化,与培养人才以及提高民众素质密切相关。他认为:“如这根本问题——人之训练问题——不解决,则所有社会的一切问题,都不

能解决,……如何训练人,……这方法第一是要将现在负起责任,……第二是……训练成功许多训练的人才,使他们能够从旧社会当中创造出新的社会来。”^{[25]241} 因此,在社会教育上,卢作孚提出,“第一步是应普及于市场;第二步是应普及于乡村的人家。社会教育的事业……是要创造许多模范事业,给予人学;其次要利用新剧、电影、幻灯、照片……给予人看”^{[25]77}。在“人”的塑造中,为了改变北碚民众的观念,开展了“现代生活的运动,识字的运动,职业的运动,社会工作的运动”^{[25]280-281}。社会工作的运动旨在“引起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兴趣,以训练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以完成地方自治的组织,尤其是进入现代的经营”^{[25]281}。同时,卢作孚提出,希望能够通过这四类运动“由帮助他们做,促起他们自己做,通过塑造环境,从而影响民众,通过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使民众能够管理公共事务,完成乡村自治的组织,担任乡村一切公共的任务”^{[25]282}。卢作孚的社会教育“依职业的种类和集中的便利而有不同的教育,有挨户教育,有长期教育,有民众问事处,有职业介绍所,有书报阅览室”^{[25]268}。据统计,经过社会教育,培养了一批批有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的人才,他们分别担任了峡防局、试验区、北碚管理局的重要工作和一般工作,还大部分参加民生公司的工作,都做出了成绩^[40]。

六、结论与启示

民国乡村建设是乡土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实践^[41]。本文通过深入剖析北碚乡村建设的演进历程,探讨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三者交织共生的营造路径,揭示了乡村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展现了社区营造的深刻内涵。在这一过程中,北碚作为社区营造的典型范例,其空间生产机制尤为显著。通过空间实践,即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环境布局的优化,北碚的物质空间得以重塑;空间的表象层面,则聚焦于社会关系网络与地方经济的重建,促进了居民间的互动与认同,构建了和谐共融的社会空间;而表征性空间方面,则是弘扬地域文化及历史记忆,强化了地方特色与归属感,让北碚的精神空间得以升华。这一系列空间生产活动,使得北碚从传统的乡村形态成为一座现代化城镇,并且在深层次上实现了社区的整体营造。北碚的乡村建设实践,不仅是对传统乡村发展模式的一次革新,更是对未来乡村可持续发展路径的一种积极探索,被誉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42]。

在北碚乡村建设运动的深刻实践中,空间生产与社区营造的历程深刻揭示了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路径与内在逻辑。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既有的物质文化遗产、社会结构与精神风貌,构成了空间生产的客观基础。基于原生环境的优化改造,北碚乡村建设巧妙地将现代化元素融入传统乡土之中,通过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升。基于原有乡村特色的空间营造,则是北碚社区营造的灵魂所在。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乡土社会面对现代化的强大可塑性,也证明了乡土社会与社区营造之间的天然契合与相互促进,其成功经验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基于此,乡村建设可以通过空间生产推动社区营造,从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第一,空间具有多维属性,乡村建设需要以乡村原有的物质空间为基础,围绕空间性这一社区特性,从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整体性塑造,为进行社区营造奠定基础。第二,乡村建设在实现物质空间的营造后,通过共同利益和共同记忆的营造,提高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实现社会空间的营造。第三,“教育是乡村中最重要的建设事业”^{[25]75},乡村建设通过推动农民教育,鼓励群众参与乡村现代化建设事业,形成乡村独特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观念,从而实现精神空间的营造。

百年回望,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众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为定县模式、邹平模式与北碚模式,这

三种模式以其独特的路径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然而,定县模式与邹平模式以文化与教育为立足点,却因忽视乡土社会的独特性与民众实际需求,未能扎根于深厚的乡土文化土壤之中,最终导致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相比之下,北碚模式以其独特的魅力与成效,成为乡村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北碚乡村建设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卢作孚的卓越领导与人格魅力。他以高尚的品德、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胆识,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拥戴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这种自上而下的领导力与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相结合,为北碚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其次,北碚乡村建设注重激发民众的内在动力,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公共服务。从民众教育到各类社会运动,北碚乡村建设不仅传授知识,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民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整体进步。这种以民众为主体的参与式发展模式,极大地增强了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北碚乡村建设以“乡村现代化”为明确目标,将发展地方经济作为核心任务。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工业与商业等多种手段,北碚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共同利益的广泛共享。这种以经济发展为驱动的空间营造过程,不仅改善了乡村的物质条件,也促进了社会空间的重构与精神空间的升华,实现了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北碚乡村建设运动中的空间生产与社区营造,不仅是对传统乡土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更是对乡土价值与社区精神的深刻挖掘与弘扬。北碚的乡村建设实践也深刻表明,乡土社会在面对现代化转型时具有强大的可塑性与适应能力。同时,乡土社会与社区营造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契合点,通过合理的规划与引导,可以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与共同发展。此外,社区营造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通过空间生产的三个维度,即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象与表征性空间,来全面推进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的营造。

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与组织振兴。其中,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保障条件。在此背景下,乡村建设运动的本质是结合现代性要素对乡土社会进行空间生产,即对乡土社会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进行生产和营造,从而实现乡土社会与现代化的耦合,从整体上实现社区营造。北碚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具有“社区营造”性质的空间生产实践,而社区营造作为一种动态性的治理过程,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一种模式和方法的借鉴,即“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三位一体的综合社区营造模式。通过空间生产推动社区营造,从而实现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目标。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挖掘地方特色资源、整合乡村共同利益、打造独特的乡村文化品牌等,都是当下亟待进一步研究的社区营造的可行路径,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参考文献:

- [1] 王翠. 卢作孚乡村建设实验的主要内容、总体评价与当代启示[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1(1): 27-31.
- [2] 顾大治, 杨震雯, 洪百舸. 三维联动: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营造与发展——桃米社区营造经验解读及思考[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1(6): 33-43, 153-154.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 (2021-03-13)[2024-07-27]. 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4] 刘祖云, 王太文. 乡村社区营造的基本方略: 符号化与空间化——基于安徽省香泉-温泉小镇社区营造的观察[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 32-42.
- [5] 尹广文. 社区营造: 一个新的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4): 159-164.
- [6] 洛根, 莫洛奇. 都市财富: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M]. 陈那波,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7] 颜昌武,杨怡宁.什么是空间治理?[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20-31.
- [8] 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J].社会学研究,2010(5):167-191,245.
- [9] 胡大平.地理学想象力和空间生产的知识——空间转向之理论和政治意味[J].天津社会科学,2014(4):4-12.
- [10] 颜昌武,杨怡宁.空间生产视角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营造——以老旧小区电梯加装为透镜[J].理论与改革,2024(1):126-138,166-167.
- [11]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 [12] 林叶.城市人类学再思: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三元关系、空间视角与当下都市实践[J].江苏社会科学,2018(3):124-135.
- [13] 王丽琼.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城市空间治理与城市摊贩文化发展研究[J].中国市场,2024(18):21-24.
- [14] 李侨明,蓝宇蕴.台湾社区营造的公共精神空心化及其教训[J].社会工作,2020(3):73-83.
- [15] 胡澎.日本“社区营造”论——从“市民参与”到“市民主体”[J].日本学刊,2013(3):119-134,159-160.
- [16] 张燕.经济的追求和文化的维护同样重要——日本“造乡运动”和中国台湾“社区营造”的启迪[J].装饰,1996(1):50-53.
- [17] 聂兰生,宋昆.交往与社区营造——未来城市社区结构形式探讨[J].城市开发,1997(9):7-9.
- [18] 刘祖云,王太文.“社区营造”:理论渊源及其理论转译[J].理论探讨,2023(5):62-69.
- [19] 罗家德,帅满.社会管理创新的真义与社区营造实践——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罗家德教授访谈[J].社会科学家,2013(8):1-4.
- [20] 徐晓鹏.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异质性分化及社区营造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1(11):28-30.
- [21] 刘怀玉.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以列斐伏尔为个案[J].河北学刊,2005(3):115-119.
- [22]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4.
- [23] 文军,黄锐.“空间”的思想谱系与理想图景:一种开放性实践空间的建构[J].社会学研究,2012(2):35-59,243.
- [24] MENEC V H, MEANS R, KEATING N, et al. Conceptualizing age-friendly communities[J].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 2011(3):479-493.
- [25] 凌耀伦,熊甫.卢作孚文集[M].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26] 刘重来.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J].重庆社会科学,2004(1):110-115.
- [27] 林尚立.社区: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2):58-64.
- [28] 刘双宁.从分散走向整合:过渡型社区公共性的再造逻辑——基于对J区L社区的考察[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3.
- [29] 北碚社会概况调查[J].社会调查与统计(第2号),1943.
- [30] 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31] 梁漱溟.怀念卢作孚先生[J].名人传记,1988(5):95.
- [32]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2版.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33] 张一兵.社会空间的关系性与历史性——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解读[J].山东社会科学,2019(10):24-30.
- [34] 蔡静诚,熊琳.从再造空间到再造共同体: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58-65.
- [35] 卢宪英.紧密利益共同体自治:基层社区治理的另一种思路——来自H省移民新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效果的启示[J].中国农村观察,2018(6):62-72.
- [36] 潘洵,李桂芳.卢作孚与中国近代乡村现代化的“北碚现象”[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44-50.
- [37] 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38] 张守广,项锦熙.卢作孚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
- [39] 郭文.“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J].经济地理,2014(6):33-39,32.
- [40] 北碚开拓者卢作孚[Z].重庆市北碚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8.

- [41] 宣朝庆,王茹薪. 地方性再生产的时空逻辑——基于北碚乡村建设的理论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81-92.
- [42]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第3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311.

Spatial Production and Community Building: Rural Construction in Beibei Model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LIN Shunli, ZHAO Zifa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Hebei, China)

Abstract: How to achieve spatial production and community building to facilitate the transi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towards moder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Beibei model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examining the process of spatial production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Beibei's rural construction, it seeks to uncover the basic logic of community building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rural products are the objective basis for spatial production, while optim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rural characteristics are important means of community building. This study ha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achievement of modernization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Keywords: spatial production; community building;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ibei model

(责任编辑:邓龙奎)